

正眼看世界*

——日治台灣新舊文學論戰帶動的時空認知變化

蘇碩斌

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教授

摘要

本文解釋 1920 年代「新舊文學論戰」是台灣首次將文學予以問題化，從而造成社會時空認知的重要變革。台灣這個文學變革，與西歐的現代小說之出現有可資比擬之處，因此，本文借助西方文學理論展開三部分推論：（1）時空體作為文學研究的方法論：借用瓦特及巴赫金的觀念，提出「時空體」方法論，並設定具體的時空、準確的觀察作為分析台灣新舊文學論戰的基本判準；（2）新舊文學論戰的時空體交鋒：探討文學論戰由最初的文白語言之爭轉向文學的時空體系之辯，雙方在詩和小說的攻防，造成傳統文學的引譬連類式世界觀發生鬆動，並促使關注當下經驗時空認知受到社會肯認；（3）賴和作品時空轉變為例證：以橫跨舊新文學創作的賴和為例，分析他的詩作與現實的關係，以及從舊詩轉向新文學的歷程，以印證他的時空認知變革。透過以上三部分的論證，本文指出 1920 年代台灣新舊文學論戰，真正引發台灣整個世代的社會時空認知變革。

關鍵詞：新舊文學論戰、現代文學、時空體、寫實主義、觀察

* 本文曾以不同形式的初稿於「世界、啟蒙、在地：臺灣文化協會一百週年紀念學術研討會」及「台灣哲學與文學文化的交涉國際學術研討會」宣讀，研究過程獲國科會專題計畫（MOST 109- 2410-H-002 -210 -MY2）支持，寫作期間曾獲湯志傑、林文凱、蔡明燁等先進關於現代性議題的指教，並承蒙匿名審查委員深具建設性的意見，謹一併致上最高謝忱。

Facing the World with Observation:

Chronotopic Transformations Driven by the New-Old Literature Debate in 1920s Taiwan

Su Shuo-Bin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New-Old Literature Debate in 1920s Taiwan marked the first moment in which literature was problematized, leading to a significant transformation in the societal perception of time and space. Since this transformation is comparable to the emergence of the modern novel in Europe, the article draws on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to compare conceptions of time and space, developing three main lines of argumentation. The first section, entitled “Chronotope as a Methodological Framework for Literary Studies,” draws on the concepts of Ian Watt and Mikhail Bakhtin. In it, the “chronotope” is foregrounded as a methodological approach. It emphasizes concrete spatiotemporal settings and precise observation as the analytical foundation for interpreting Taiwan’s debate on new and old literature. The second section, “Chronotopic Confrontation in the New-Old Literary Debate,” examines how the debate evolved from an initial dispute over classical versus vernacular language into a deeper confrontation between competing literary chronotopes. Through the contestation around poetry and fiction, the traditional worldview—based on metaphorical analogy and categorical association—began to erode, giving way to a growing social recognition of contemporary experiential time and space. The third section,

“Lai He as a Case of Chronotopic Transformation,” focuses on Lai He, a writer who spanned both old and new literary practices, as a representative figure. In its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s poetry and social reality, as well as his transition from traditional poetry to modern literature, it illustrates a shift in his perception of time and space. Together, these arguments demonstrate that the literary debates of the 1920s catalyzed a profound transformation in Taiwan’s chronotopic consciousness, reshaping how a generation imagined time and space.

Keywords: New-Old Literature Debate, Modern Literature, Chronotope, Realism, Observation





一、前言及問題意識

本文解釋 1920 年代台灣「新舊文學論戰」引出的社會變革意義——對台灣而言，論戰的重點並不是舊文學和新文學的對立或孰勝孰負，而是台灣因為論戰而第一次將文學問題化（*problematized*），進而透過辯詰而對文學與社會的時空關係重新界定。

1920 年代前後，台灣知識分子已體認文學書寫的重要；即使不是文學人，也肯定文學可以表達人生——以著名的社會革命家蔣渭水為例，並不是天生文學人，但論述書寫能力卻由 1910 年代的不甚突出、到 1920 年代的大幅進步。具體事證除了 1921 年〈臨床講義〉已知使用換喻文學技巧，以及 1923 年到 1925 年治警事件兩次入獄時的大量閱讀、自修早稻田大學政經講義、吸收社會主義思想，更引人注意的是蔣渭水從此蛻變的書寫能力——即學者陳翠蓮考察的，「出獄後的蔣渭水脫胎換骨，……過去在《臺灣民報》上多從事翻譯新聞的他，出獄後已能滔滔論述。」¹

出獄後蔣渭水不只滔滔論述，更有文學壯志。1925 年《臺灣民報》一萬部紀念號的回憶文章，他細數年輕時參與學生大會、開設冰店、籌劃袁世凱事件等，並表露：

這些學窗時代所做了的活劇，今日靜夕地回顧起來，真是津津有味、也有可笑的、也有可驚的、也有可悲憤的、也有可痛快的、也有很危險的。……若一寫出來，可做一篇的小說。我這回在獄裡，本有計劃要寫出、因為紙筆都被取去、不能寫出來、實在是很遺憾！²

蔣渭水事隔十餘年，想用以表達那些 1911 年前後「復元會」經歷的形式，是小說。他甚至說，若有機會寫出「最好是俟至本社創刊十週年民報發行五萬部的祝賀紀念號上，來發表為最妙」。³或許只是笑談，也遺憾小說並未寫成。不過，

1 陳翠蓮，《自治之夢：日治時期到二二八的臺灣民主運動》（台北：春山出版，2020.08），頁 128。

2 蔣渭水，〈五個年中的我〉，《臺灣民報》67 號，1925.08.26，43-45 版。

3 同註 2。

臺灣第一篇現代小說〈彼女は何處へ？〉⁴是刊在《臺灣民報》的前身《臺灣》，從此之後，《臺灣民報》就是臺灣最重要的新文學小說之出版園地。作為《臺灣民報》核心成員的蔣渭水，想以小說表達現實，應是在這條文學史脈絡之中，也意謂新舊文學論戰的影響力，已瀰漫至整個文化圈。

新舊文學論戰並不只是侷限在純文學的論戰。從世界文學史的進程來看，西歐、中國或日本，文學的定義都在現代小說出現之後產生巨大變化。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考察英文“Literature”用法之演變、鈴木貞美考察漢語及日語「文學」用法之演變，年代雖有落差但趨勢則相似——文學，最初都指涉廣博閱讀能力，延伸到指涉高雅知識的書寫能力，再到現代社會則指涉「具有想像力或原創性」的語言藝術。傳統到現代的轉折關鍵，即是現代小說在18世紀的西方出現。⁵台灣文學也和此趨勢相符，都是社會的讀寫知識階層（或稱文化圈）發生結構性的轉變，然後才進入現代的、專注創造性語言藝術的狹義文學。因此解釋台灣新舊文學論戰，即應解釋讀寫知識階層對世界的認知與表達。

蔣渭水支持的新文學知識分子，在籌組的臺灣文化協會《趣意書》上宣示，「回顧島內，今也新道德之建設未成，而舊道德早已次第衰頹」，⁶並且直白寫出舊道德代表人物就是「位居上流者，概以揣摩迎合是務，以搏取一身之榮達為能事」。⁷這些人是誰？應沒有明確的身分統稱。但借用若林正文區分的兩種日治台灣「朝聖圈」的知識分子，舊道德代表大略是：向著中華王朝的「士大夫朝

4 〈彼女は何處へ？〉原刊於1922年7月10日至10月6日《臺灣》3年4號至7號「和文之部」，作者筆名追風，其作為台灣第一部現代小說之論點，自1990年代起即有廣泛論據。參考張恆豪，〈評追風〔謝春木〕及其小說《她要往何處去》〉，《國文天地》77期（1991.10），頁40-44。

5 威廉斯認為Literature一字是拉丁文littera至14世紀轉化進入英文世界，初與literate（識字）意義相近；而後印刷術推波助瀾，17世紀轉向擁有高雅學識、擅長寫作的belle-letters（善寫）概念，19世紀再轉向「富有原創性想像力」的語言藝術之義；中文及日文的「文學」亦有不同時程的相似趨勢，初始儒學的「文學」指涉解讀典籍的學問能力（如子游、子夏），到六朝轉變為著述文章技能（曹丕的《典論論文》倡議）、至宋元再加進著述小說、傳奇的技能，而1917年後才由魯迅等人從日本導入英語literature的譯名「文學」及其概念。參考Raymond Williams,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134-137；鈴木貞美著，王成譯，《文學的概念》（中國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頁45-51。

6 葉榮鐘，《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下（台中：晨星出版公司，2000.08），頁332-333。

7 同註6。

聖圈」，相對的，是以台灣規模為尺度的「台灣知識分子朝聖圈」。⁸

台灣知識分子朝聖圈，有界定清楚的邊界，留學日本、參與中國社會改革、支持辛亥革命、認同台灣自主革新者。而傳統知識分子的士大夫則邊界模糊，⁹這些人物，大致即是清末留存的傳統「領導階層」，如士紳、街商、地主或儒士，¹⁰至多再加入日治初期配合殖民官府的「紳商文士」，或是擁有記者身分的「古典文人」。¹¹大抵而言，這些人物多是清代科舉官僚（251名舉人、29名進士）及其預備軍的積累，在日治時期則擴散至各地社交場所的詩社、教學用的書房等處。就如若林正丈指出的，這些人雖散居各地，但卻憑藉某種「相互連結意識」即可連結。相互連結意識的材料為何？若林正丈指向「用漢字書寫而累積起龐大文獻」，¹²亦即，一種歷代文史典故累積構成的參照體系。

1920年代新舊文學論戰，為台灣二種朝聖圈的知識分子首度正面論述交鋒。不只是文學的論戰，也是思維和道德的論戰，更是對生活世界的時間及空間之認知之論戰——論戰前以邊界遼闊的漢字文獻為參照，論戰後則出現以台灣規模的現實世界為參照。

台灣過去幾十年有關新舊文學論戰已累積大量研究結果，學界也大致同意不能採取「新文學勝出、舊文學潰敗」的線性質樸二分對立論點。¹³相關的台灣文學發展史，就如河原功的分期所述，新舊文學論戰前的台灣殆無疑義是「漢詩、漢文為唯一的文學表現時代」，但論戰之後的台灣，其實並不是河原功著眼的「新

8 若林正丈著，許佩賢譯，《臺灣抗日運動史研究》全新增補版（台北：大家出版，2020.03），頁387。若林正丈稱「朝聖圈」此一概念最早見諸東南亞研究學者古田元大的用法。

9 同註8，頁388。

10 蔡淵黎，〈清代臺灣社會領導階層性質之轉變〉，《史聯雜誌》3期（1983.06），頁34-64。

11 李敏忠，〈日治初期殖民現代性研究——以《臺灣日日新報》漢文報衛生論述（1898-1906）為主〉（台南：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頁11-12。

12 同註8，頁387-388。

13 二分、對立論點，應始於廖漢臣1954年〈新舊文學之爭：臺灣文壇一筆流水帳〉詮釋區分的論戰三階段，「最初一個階段，是新舊二個對立陣營的抗爭時代，其次一個階段，是舊文學陣營的挨打時代，再次的一個階段，是舊文學陣營的內訌時代。」這種論點經陳少廷，《臺灣新文學運動簡史》（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77.01）、古繼堂，《臺灣新詩發展史》（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9.07）、彭瑞金，《臺灣新文學運動40年》（台北：自立晚報出版社，1992.04）皆有相近史觀。參考葉連鵬，〈重讀日據時期台灣新舊文學論戰起因、過程與結果的再思考〉，《台灣文學學報》2期（2001.02），頁35。

文學抬頭期」及「自立上升期」而已。¹⁴ 因為論戰之後，舊文學和新文學雙方都產生變化。不只新文學持續有大量的小說、新詩、散文作品之產出；古典詩人也未在台灣消失，甚至持續活躍全台，作家人數和社團數量都高於新文學，甚至發表作品的刊物媒體也多於新文學。¹⁵ 也就是說，新舊文學論戰不是哪一方勝或負的問題。

文學在現代社會轉型之際產生巨變，台灣並不是孤例。賴和（以筆名懶雲）在 1926 年台灣新舊文學論戰之後曾說：「新文學運動，純然是受西學的影響而發動的，所以有點西洋氣味，是不能否認，又且受著時代的洗練尚淺，業績猶未完成，也是事實。」¹⁶ 因此，雖然相對於英國最早出現現代小說的 1720 年代晚了近兩百年，但台灣一如賴和所稱、在西學影響脈絡之中發展，雖有氣味相似之處、但確也自身時代的特殊面向。若對照英國文學史家瓦特（Ian Watt）將現代小說作為文學史重大斷裂的論點，可以將傳統文學視為人物類型化、時空模糊化之技法，而現代小說則明顯具有人物獨特化、時空明確化之特質，並以「寫實主義」指認現代小說代表的世界觀轉折。¹⁷ 瓦特分析現代小說寫實主義世界觀的最重要切入點，即是時間和空間的認知。

因此，本文主張可循瓦特的同樣設定——以文學人的時間、空間的認知和技法，作為探討台灣受到西學影響而進入現代文學的軌跡。也就是，探問新舊文學論戰如何展開「文學成為問題化」的歷史成因。這裡所謂的問題化（problematization），意思是去指認某個事物如何在特定的歷史條件與社會實踐中被構成、但卻是為「問題」的現象。依傅柯（Michel Foucault）的方法論設定，亦即原本被視為理所當然、不證自明的事情，因此必須重新思辨、必須重

14 河原功著，莫素微譯，《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展開：與日本文學的接點》（台北：全華科技圖書，2004.03）。頁 120-121。河原功論證第二期至戰爭前夕進入最後第三期是「戰時的台灣文學」，之後即過渡到戰後。

15 葉連鵬，〈重讀日據時期台灣新舊文學論戰起因、過程與結果的再思考〉，《台灣文學學報》2 期，頁 61。

16 懶雲，〈讀臺日紙上的「新舊文學之比較」〉，《臺灣民報》89 號，1926.01.24，11 版。

17 Ian Watt, *The Rise of The Novel: Studies in Defoe, Richardson and Fielding*.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7, pp. 10-30.

新踐行。¹⁸

1920年代的台灣，文學人原本理所當然的傳統參照系統，突然遭到逼問那是什麼？為誰而寫？該寫什麼？正是一種文學的時空體與社會的時空體之問題化。

二、文學與社會的時空研究之方法論

新舊文學論戰之際也是台灣現代小說出現之時。現代小說的具體起點，一般多指認是1922年鷗〈可怕的沈默〉、追風〈彼女は何處へ？〉、1926年賴和〈一桿稱仔〉這三篇作品。雖然三篇各有不同語言及形式，但依張俐璇解析，三篇都具有文學描述與社會現實合一之內涵，都是為了碰觸更大社會結構而書寫的寫實主義小說。¹⁹ 這個論點，也呼應了先前葉石濤評斷賴和轉向寫新小說〈一桿稱仔〉是「確立了台灣寫實主義文學傳統」，²⁰ 以及陳建忠總結賴和對台灣現代小說的成立之貢獻，「可以說就是寫實小說的成立」。²¹

寫實主義文學背後其實有一套世界觀，與過去的漢詩、傳奇小說大不相同，而寫實主義既為台灣現代小說的起點，即有必要借助西方理論史的分析，重估其在台灣文學史的意義。

瓦特論證，英國現代文學運動，始於1719年笛福（Daniel Defoe）《魯賓遜漂流記》（Robinson Crusoe）、及緊接的芮察生（Samuel Richardson）及費爾丁（Henry Fielding）陸續出版小說而形成。瓦特特別強調，小說的出現是與當時哲學思潮相呼應的，尤其是洛克（John Locke）等人的經驗實在論（empirical realism）。洛克主張真實世界是一種客觀的存在，但人類無法直接認識這個世界自身，因此必須透過感官經驗以獲得（而絕非透過神的給予）；因此每個人的

18 Michel Foucault, "The Ethics of the Concern of the Self as a Practice of Freedom." *Ethics: Subjectivity and Truth*. Translated by Robert Hurley and others, edited by Paul Rabinow, The New Press. 1997, p. 286.

19 張俐璇，〈建構與流變：「寫實主義」與臺灣小說生產〉（台南：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博士論文，2014），頁40-84。

20 葉石濤，〈世界文學的寫實主義與台灣新文學的寫實主義〉，彭瑞金主編，《葉石濤全集 18 評論卷六》（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籌備處；高雄：高雄市政府文化局，2008.04），頁93。

21 陳建忠，《被詛咒的文學：戰後初期（1945-1949）》（台北：國家教育研究院，2007.01），頁175。

感官經驗都是獨特的，即個體化原則（principle of individuation）。²² 瓦特認為，18世紀初的文學寫作者就在呼應經驗實在論的世界觀，因而發展出迥異於過去的傳奇或史詩之文學技法。前述的笛福等三人，小說的內容及風格雖相異，但同時揮別了過去文學關注神話或英雄的典型性（the typical）和普遍性（the universal），而總是將小說當作人類經驗的完整真實報告，致力讓讀者知悉經驗上的細節，例如角色的個性特徵、行動的時間與地點，亦即瓦特所稱的「形式寫實主義」（formal realism）的特質。²³ 在瓦特的分析中，現代小說和「傳統文學」的最大差異就在於：時間、空間。

巴赫金（Mikhail Bakhtins）的時空體（chronotope）²⁴ 概念，適可提供這種文學變革的方法論基礎。巴赫金認為，一般人只能認識自己所處的時空，而文學則有能力掌握「被藝術性表達的內在相關之時空關係」。²⁵ 巴赫金追溯了西方的希臘傳奇、冒險小說，再到中世紀拉伯雷小說，找到了差異極明顯的小說時空體之轉變，也找到了那個社會的人們對時間與空間的概念之轉變。²⁶ 巴赫金研究學者畢蒙（Nele Bemong）即指出，文學時空體作為一種方法論，「既是對虛構世界的認知，也指向人類行為的空間和時間嵌入」。²⁷

巴赫金用來對比現代小說的傳統文學時空體為何？以希臘傳奇（Greek Romance）為例，文學內的故事，是由一件接一件的奇遇構成的無限延長，奇遇

22 Ian Watt, *The Rise of The Novel: Studies in Defoe, Richardson and Fielding*, p. 21.

23 同註 22, p. 32.

24 時空體（俄文 хронотоп，英譯 chronotope）為巴赫金在 1937 年寫成、1975 年發表的論文 Роман как жанр и хронотоп（作為文類和時空體的小說）提出的概念。此詞彙在華文世界一般有「時空體」及「時空型」二個譯名，本文採用「時空體」作為譯名，因巴赫金自稱此概念參考自物理學家愛因斯坦、生物學家烏赫托姆斯基（A.A. Ukhromsky），具有約定俗成的、生成式結構的規範力量，在文學研究上較接近文類及語體之意，而非模型或類型之意，相關討論可參考巴赫金（Mikhail Bakhtin）著，白春仁、曉河譯，〈小說的時間形式和時空體形式——歷史詩學概述〉，錢中文主編，〈小說理論〉（中國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06），頁 274-460。

25 Mikhail Bakhtin, "Forms of Time and of the Chronotope in the Novel: Notes toward a Historical Poetics."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Four Essays*. Translated by Caryl Emerson and Michael Holquist, edited by Michael Holquist,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1, p.84.

26 Simon Dentith, *Bakhtinian Thought: An Introductory Reader*. Routledge, 1995, p. 50.

27 Nele Bemong, et al. "Preface." *Bakhtin's Theory of the Literary Chronotope: Reflections, Applications, Perspectives*. Nele Bemong, et al. editors, Academia Press, 2010, pp. III-V.

的時間模糊、地理廣濶、人物沒有具體名字，劇情悉以「突然間、無巧不成書」的機運推進——因為在文學外的世界，那時代的生命重要性遠遠超越在眼前的現實以外。²⁸ 瓦特也以同樣立場掌握希臘傳奇的敘事模式，不論英雄或浪漫、傳說或寓言，從希臘艾斯奇羅斯（Aeschylus）到莎士比亞（Shakespeare）的既往敘事傳統都在關注理想、集體的「普遍性」，而不重視「個體性」，以致「事件序列被置於非常抽象的時空連續體（continuum of time and space）」之中進行，時空維度也都相當模糊、不具體的。²⁹

現代小說的技法則大大不同。笛福《魯賓遜漂流記》是第一本凡人日常活動為題材的虛構作品，³⁰ 但每個角色或情節即使為虛構，也都活在清楚的時空、以歷歷在目的方法描繪，「其虛構世界中的痛苦，如同其中的快樂一樣，真實得如同現實世界一般具體可感」。³¹ 威廉斯統稱 18 世紀初作為新文類技法的「寫實主義」，就是專注對尋常、當下、每日現實（ordinary, contemporary, everyday reality）進行描寫，將萬物都轉換為作者「可觀察的經驗」（observable experience）。³² 寫實主義在 18 世紀開始橫掃英國文壇，也對社會造成重大影響，小說人物呈現的行為規範，都為當時的閱讀大眾辨識為熟悉世界的一部分。³³

瓦特跳脫新批評（New Criticism）文本自足的文學觀，將文學連結歷史及社會脈絡，確為當時首創獨到之處。³⁴ 威廉斯則又發現，英國寫實主義小說置身布爾喬亞興起的社會，格外關注社會不堪、暴露、污穢的一面，因而成為進步派與革命運動的代表。³⁵ 因此，如戴維斯（Lennard Davis）研究指出，那時的寫實主義小說家，已告別文學由唐吉訶德式想像力支配的時代，而特別喜愛結合新聞

28 同註 25，pp. 121-122.

29 Ian Watt, *The Rise of The Novel: Studies in Defoe, Richardson and Fielding*, p. 23.

30 同註 29，p. 27, 73.

31 同註 29，p. 95.

32 Raymond Williams, *The Long Revolution*. Penguin, 1961, p. 300.

33 Michael Seidel. "The Man Who Came to Dinner: Ian Watt and the Theory of Formal Realism." *Eighteenth-Century Fiction*, vol. 12, no. 2-3, 2000, p. 194, 212.

34 Daniel Schwarz, "The Importance of Ian Watt's *The Rise of the Novel*." *The Journal of Narrative Technique*, vol. 13, no. 2, 1983, p. 59.

35 同註 32，p. 301.

報導、法律紀錄、日記與證詞等材料以發展敘事策略；例如笛福為營造可信度而運用第一人稱及日記文本，都在使故事看似真實紀錄，戴維斯稱之「虛構性之事實化」(factualizing of fictionality)。³⁶

明確的時間和空間，有憑據且可觀察的事實，正是巴赫金時空體的方法論預設。而在研究實務操作上，時空體其實還可再切割為更實用的單位。如社會語言學者布蘭馬特(Jan Blommaert)即主張時空體應運用在特定時代共存、拉扯的不同單位，因此提出「社群尺度」(scale of community)作為分析基準，透過時空體，同一時代的不同社群即可呈現不同運用語言的社會習性。³⁷

借取這一系列的方法論架構，本文試著將「時空體」設定為文學變遷的分析框架，並設定不同知識社群作為「時空體」攻防的承載者。依此設定，新文學陣營主張的「寫實主義」論述，即為現代時空體論點的承載者，要求面對當下時空、以個性為主要訴求；相對的，舊文學陣營即為傳統世界觀的時空體之承載者，要求連結超越性時空，以通性為文學目標。

傳統知識分子的時空觀，可透過近年有諸多發展的「抒情傳統」脈絡（尤其是鄭毓瑜的引譬連類體系）作為定位基礎；其次，再進行新文學的時空觀界定，而後展開二者的文學攻防和認知變革之討論。

台灣傳統知識分子是中華帝國朝聖圈者，書寫的參照體系承自漢文學的古籍累積。這裡試以「抒情傳統」作為解釋其參照體系的的概念。「抒情傳統」概念在1970年代在美國由陳世驥、高友工接續提出，將「抒情」對比西方文學的「敘事」傳統，而由台灣的學者開發壯大。³⁸ 例如柯慶明以《詩經》為解讀基礎，將「抒情」透過「詩言志」來詮釋人與人之間、人與天地之間的情感交往，並理出中國文學傳統有一種「『事出於沉思，義歸乎翰藻』的言志、神韻的以文字為核心的文學」。³⁹ 鄭毓瑜將這道脈絡再延伸至物、空間的探討，達致以「引譬連類」

36 Lennard J. Davis, *Factual Fictions: The Origins of the English Novel*.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97, p. 223.

37 Jan Blommaert, "Chronotopes, Scales, and Complexity in the Study of Language in Society."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vol. 44, 2015, pp. 105-116.

38 陳國球，《抒情傳統論與中國文學史》（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2021.07），頁19-52。

39 柯慶明，〈二十世紀的文學回顧：由新文學到現代文學〉，《沉思與行動：柯慶明論臺灣現代文學與文學教育》（台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21.04），頁29。

作為捕捉中國傳統文學的關鍵概念。

所謂「引譬連類」是指：文字運用的「引譬」與文字以外世界意義的「連類」二者在文學動作之際結合的思維體系；在這套體系中，詩人詠詩所使用的譬喻，就不是詩人針對兩個孤立的事物進行比擬，而是進入過去累積的引譬連類體系，思索不同的物與物、物與人、人與天地四時之間體系關係的引生，不停演練不同類域間「視如」、「想成」等情景、物我、言意的關係。⁴⁰

鄭毓瑜察知的中國傳統文人，即使觀察天地萬物，卻不必然在探討個別「物」的究竟，因為文人的書寫是為了開展更多論述「物」的可能性，讓「物」在不斷跨越類別、跨越時空距離中彼此親附接合，以體現更為深廣的通感底層。傳統文人即使人生有新的經驗而欲加書寫表達，也都必須在框架之中努力串接舊經驗、類比連通，以開展為天地萬物的龐大關係結構。⁴¹這是一套運作數千年的內部時空體，是超越時間、空間的象徵連結模式。

引譬連類的威力，至晚清都還有明顯運作痕跡，但到現代社會就可看到衝撞痕跡了。鄭毓瑜舉 19 世紀末黃遵憲《日本雜事詩》來說明引譬連類的跨時間作用力。黃遵憲出使日本，看到火車、博覽會等未曾見的各種新奇事物，而當他想要書寫成詩之時，卻仍須在舊詩體系尋找詞彙，致使這些雜事詩的本文，都是以典事成詞在形容新事物（例如以三神山、桃花源在形容日本），至多只在「注文」添加新詞來補充標示新事物。鄭毓瑜因而總結，《雜事詩》根本是「運用中國的一套累積各種人、事、物、地所構成的典故系統去描述日本」，是置身新世界的文人面對老問題的糾纏與窘迫。⁴²

黃遵憲的窘境是，人生經驗難得觀察到的事物，竟難以對應既有典籍知識體系；面對現代變動的新世界，身為古典詩人，仍只能以「類物」框架去含攝眼前

40 鄭毓瑜，〈類與物——古典詩文的「物」背景〉，《清華學報》41卷1期（2011.03），頁3-37；鄭毓瑜，〈「文」的發源——從「天文」與「人文」的類比談起〉，《政大中文學報》15期（2011.06），頁113-142。

41 鄭毓瑜，〈1870年代中、日漢詩人的視域轉換——以博物知識、博覽會為認知框架的討論〉，《淡江中文學報》25期（2011.12），頁105-124。

42 鄭毓瑜，〈舊詩語的地理尺度——以黃遵憲《日本雜事詩》中的典故運用為例〉，王瓊玲主編，《空間與文化場域：空間移動之文化詮釋》（台北：漢學研究中心，2009.10），頁281-282。

之「物」，或說以現代之物來揭露隱伏類應的模式。⁴³ 因此，他眼前觀察到的具體事物，就受限於引譬連類的體系而成為沒有具體時間、空間的詞彙。

台灣 1920 年以前就已有現代世界的新事物。日本 1895 年殖民統治台灣後，很快就啟動各種調查及整備，時空的基礎建設在 1910 年代就已有劇變——時間結構方面，自 1908 年縱貫鐵路通車、火車時刻表出現，即已逐步形成鐘錶指針清楚統一的「客觀時間」；⁴⁴ 空間結構方面，總督府實施土地調查、地圖繪製、市區改正等工程後，也形成門牌編號清楚、土地區劃明確的「均質空間」。⁴⁵ 然而日本殖民政府為「台灣」創造了明確的政治與行政範圍，並不因此台灣就會成為社會、文化的「台灣」。⁴⁶ 台灣的傳統文人，身體活於精確、科學概念下的時空環境，文學思維恐仍未必須浸淫在傳統的引譬連類體系。即使不少研究致力探討日治台灣傳統文人已樂於擁抱現代、大量描繪新物，甚且討論異國。亦即，台灣雖早已有客觀事實上的全島規模時空結構，但文人書寫仍參照舊的時空知識體系，以致雖知客觀事實，但是不足成為文化空間。

雖如黃美娥、廖振富等學者指出的，台灣漢文人早在 1920 年前已投入現代公共議題，吟作的古典詩也以頗多現代物入詩（包括飛機、留聲機、自由戀愛），⁴⁷ 櫟社等詩社也有社規、人員登錄、主題作文等現代行政運作，看得出古典文人在日治時代也具有現代意義。⁴⁸ 然而，其思想參照體系是否已有轉換？恐也不盡然。黃美娥剖析舊文人已有進化，而游移在傳統和現代、接納與排斥之間，多由文章把現代事物寫進「內容」來闡述他們置身時代的艱困。但，這些飛機、留聲機在文章能否融入「形式」上的古典時空參照體系，則仍待考察。以舊文學另一種書

43 廖棟樑，〈書評：《引譬連類：文學研究的關鍵詞》〉，《中國文哲研究集刊》42 期（2013.03），頁 253。

44 呂紹理，《水螺響起：日治時期台灣社會的生活作息》（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998.03）。

45 蘇碩斌，《看不見與看得見的臺北》（台北：群學出版公司，2010.09）。

46 吳密察，〈「台灣文化」的歷史建構——一個初步的試論〉，《台灣國際研究季刊》10 卷 3 期（2014.09），頁 4。

47 黃美娥，《重層現代性鏡象——日治時代台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台北：麥田出版社，2004.12），頁 31-77、頁 149-176。

48 廖振富，〈百年風騷，誰主浮沉？——二十世紀台灣兩大傳統詩社：櫟社、瀛社之對照觀察〉，《台灣文學研究學報》9 期（2009.10），頁 215-216；李知灝，〈社群的「現代」意義：以「櫟社」暨其詩人作品為研究中心〉，《台灣文學研究》5 期（2013.12），頁 95-135。

寫類型通俗小說為例，許俊雅從日治初期出現的大量通俗小說寫進了現代事物，發現其書寫模式是由中國文言筆記小說轉錄改寫，而且幾乎都會「省略時空」。⁴⁹呂淳鈺考察日治初期偵探小說的脈絡，也發現多是模擬自中國的公案小說（施公案、包公案等），敘事脈絡也仍停在以舊體系的倫理人情作為判案準繩。⁵⁰

由此看來，台灣早期的漢詩、小說等文學創作，即使文章之間敘及現代事物，但其背後思維所仰賴的參照體系仍是舊的一套，是以在新舊文學論戰時，漢詩、公案小說成為新知識分子的攻擊點，即在此一脈絡。

綜上方法論點，本文認為，時空體適可應用於 1920 年代新舊文學論戰的分析議題。以下各節將具體探討：新舊文學論戰雙方如何將文學問題化，並針對時空體進行攻防，續以賴和為個案代表討論文學的轉向進行論證。

三、新舊文學論戰的時空體交鋒

台灣在 1920 年代以前並非從未討論過文學的現代意義。至少《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的記者群即在 1907 年間有過多篇論見。1907 年 1 月舊體小說家李逸濤以筆名逸濤山人撰寫〈小說芻言〉一文介紹歐洲小說不同於支那小說；⁵¹ 10 月謝雪漁〈文學辨義〉一文釋義「文學」有廣、狹義之分，支持新式的小說、戲曲。⁵²但這幾位身兼創作者的記者，雖然接收到西方新觀念，然而意見只是偶發、並未串連成一場運動，而且他們的小說創作也仍滯留在傳統士紳階層的世界觀。⁵³也因此，日治初期雖有反省傳統儒學的零星動作，但並未啟動大規模的現實議題書寫革命，也未擴散成挑戰體制的思想，直到 1920 年代的新舊文學論戰。⁵⁴

不同文學社群有各自認識時空的方式，文學中設定的時空狀況，可以了解一

49 許俊雅，〈日治時期台灣報刊小說的改寫現象及其敘述策略〉，《台灣文學學報》23 期（2013.12），頁 171-172。

50 呂淳鈺，〈日治時期台灣偵探敘事的發生與形成：一個通俗文學新文類的考察〉（台北：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頁 34-36。

51 逸濤山人，〈小說芻言〉，《漢文臺灣日日新報》2601 號，1907.01.01，5 版。

52 雪漁攷誌，〈文學辨義〉，《漢文臺灣日日新報》2847 號，1907.10.28，3 版。

53 黃美娥，〈重層現代性鏡像——日治時代台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頁 316。

54 許倍榕，〈日治時期台灣的「文學」概念演變〉（台南：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博士論文，2015），頁 70-71。

個時代如何主張文學和社會的關係。⁵⁵本節據此「時空認知」以考察 1920 年代初的新舊文學論戰的二個重點，其一是新文學挑戰舊文學的類性及時空認知，其二是新文學建立觀察此時此地的獨特經驗之訴求。

新舊文學論戰雙方的真正攻防始自 1924 年，即葉連鵬所謂論戰三個時期的「熱戰期」。⁵⁶在熱戰期之前的醞釀期，新文學一方自 1920 年至 1922 年間僅有《臺灣青年》的三篇文章，⁵⁷平均一年一篇，多在鼓吹白話文、批判文言文的零星火花。即使 1923 年黃呈聰、黃朝琴、潤徽生等加入，論點也都在重訴白話文是世界潮流、應將「艱難的文學換做創造容易的文學」。⁵⁸

這些文章的論點共同都有一種民族主義的跳躍，亦即從要求言文一致改革、主張白話文啓發民智，然後即迅速推論到圖謀民族強盛和國民團結。⁵⁹然而，從舊文體轉換到新文體，絕非放棄艱難的文言，改採簡單的白話文那麼容易的過程。其實前述主張白話文的新文人，陳炳、陳端明的文章是以文言文寫成，1923 年末的潤徽生也是文白交雜、行文不順，甚至新文學陣營自己人也有怨言。⁶⁰

55 本橋哲也，〈バフチンと「民衆」文化の力学——クロノトポスとしての演劇・小説・詩〉，《思想》940 期（2002.08），頁 50-51。

56 醞釀期指 1920 年《臺灣青年》創刊、到張我軍〈致臺灣青年的一封信〉發表前，新文學訴求白話文代替文言文，但受限對白話文知識有限，論點也未深入，舊文學陣營未應戰；熱戰期指 1924 年 4 月張我軍〈致臺灣青年的一封信〉發表，舊文學陣營有連雅堂、鄭坤五、羅秀惠等人激烈回應，再至 1925 年 8 月張我軍發表〈新文學運動的意義〉，而後舊文學不再回應為止。之後進入餘波期。葉連鵬，〈重讀日據時期台灣新舊文學論戰起因、過程與結果的再思考〉，《台灣文學學報》2 期，頁 50。

57 三篇文章為陳炳，〈文學與職務〉，《臺灣青年》創刊號（1920.07），頁 41-43；甘文芳，〈實社會與文學〉，《臺灣青年》3 卷 3 號（1921.09），頁 33-35；陳端明，〈日用文鼓吹論〉，《臺灣青年》4 卷 1 號（1922.01），頁 25-27。

58 黃呈聰，〈論普及白話文的新使命〉，《臺灣》4 年 1 號（1923.01），頁 12-25；黃朝琴，〈漢文改革論〉，《臺灣》4 年 1 號（1923.01），頁 25-31；黃朝琴，〈續漢文改革論〉，《臺灣》4 年 2 號（1923.02），頁 21-28；秀潮，〈中國新文學運動的過去現在和將來〉，《臺灣民報》1 卷 4 號，1923.07.15，3 版；高冠吾，〈漢文字改革之管見〉，《臺灣民報》1 卷 13 號，1923.12.11，4 版；潤徽生，〈論文學〉，《臺灣民報》1 卷 14 號，1923.12.21，3 版。

59 崔末順，〈現代性與臺灣文學的發展（1920-1949）〉（台北：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4），頁 84。

60 1924 年 3 月《臺灣民報》2 卷 4 號，有施文杞、逸民（林耕餘）兩文抱怨台灣的白話文亂象，批評當時新文人使用白話文的文法多錯、胡亂使用自身方言寫文章。參見施文杞〈對於臺灣人所做的白話文的我見〉、逸民〈對在臺灣研究白話文的我見〉，《臺灣民報》2 卷 4 號，1924.03.11，8 版；另見葉連鵬，〈重讀日據時期台灣新舊文學論戰起因、過程與結果的再思考〉，《台灣文學學報》2 期，頁 44。

舊文學的文章，不只是使用文言文、言文不一致、字意艱難這樣的問題而已，更是牽涉深層「時空認知」的思考體系問題。本文以「時空體」作為方法論，將把分析重點放在文學的參照體系，以指明新舊文學論戰是新文學陣營以「寫實主義」的時空認知、挑戰舊漢詩文依循的「引譬連類」體系之時空認知。

批判舊文學時空體系之始，是《臺灣民報》1924年4月的張我軍〈致臺灣青年的一封信〉、6月的蘇維霖（蘇薌雨）〈二十年來的中國古文學及文學革命的畧述〉。之後舊文學有所反駁，再來即新文學陣營的張梗、張我軍的連續多篇長論，逼使熱戰期升溫。新文學陣營此時期的論點，已超越1923年及之前那種單純的白話文字改革論，而進到關鍵論戰：開始討論西方文學理論關注的文學時空認知問題。

張我軍〈致臺灣青年的一封信〉的重點，雖然後來引爆點是遣詞用字不雅，但已跳脫醞釀期的文字改革論點，而攻擊古典文學思維體系，稱之無法在當前社會發生作用：

諸君怎的不讀些有用的書，來實際運用於社會，而每日只知道做些似是而非的詩，來做《詩韻合解》的奴隸，或講什麼八股文章替先人保存臭味。……竟然自稱詩翁、詩伯，鬧個不休。⁶¹

暫不論張我軍稱舊詩人「在糞堆裏滾來滾去，滾到百年千年，也只是滾得一身臭糞」的不雅用詞這個引爆點，若從時空認知來分析，這兩篇確不同於以往的文白簡化論，而直攻舊文學的「系統性缺失」。緊接的蘇維霖〈二十年來的中國古文學及文學革命的畧述〉轉述胡適的〈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同樣攻擊古舊文學在當代社會的失能：

古文學是一種貴族的文學，不能同一般人發生交涉、滿足時代的需要、做應

61 張我軍，〈致臺灣青年的一封信〉，《臺灣民報》2卷7號，1924.04.21，10版。

用的工具……免不了「死文學」或「半死文學」的譏誚。⁶²

張我軍和蘇維霖批判的「糞堆裏滾來滾去」、「死文學／半死文學」，都是主張文學應該是「讀書—撰文—社會」的路徑，並據以批判詩翁詩伯是「讀書—寫詩—先人文學」傳統迴路。這也正是以寫實主義的主張、批判古典文學引譬連類的超越性時空認知。

張我軍〈致臺灣青年的一封信〉發文後的兩個月，1924年6月舊文學陣營《臺灣詩薈》公開出現了反新文學的文章。《臺灣詩薈》是連雅堂於1924年2月創辦、以詩鈔及文鈔為主要內容的刊物。連雅堂在辦刊宗旨即稱「科學昌明，奇才輩出……當此風雨晦明之際……彝倫攸斁，漢學式微，教育未咸，民聽猶薄，徬徨歧路，昧其指歸，差之毫釐，謬以千里」。⁶³這篇序言有深刻的舊文學習性，意思明白，典故卻艱澀迂迴。句中「彝倫攸斁」語出《書經·堯典》，字面意義是「恆久倫理已在毀壞」，想傳達詩人必須迴護漢學才不會走錯路。這種反覆徵引先人文句以回應眼前世界問題，正是舊文學的行事方式。

1924年6月《臺灣詩薈》5期，已有正面迎戰新文學之姿，具體文章為孫世揚的〈文學管窺〉：

數千年之間，變已屢矣。乃有不可變者三事。文足以抒己之情一也，意足以感人之情二也，音聲節奏可以歌誦三也。具此三者始可言文。……今遠西所謂文學者，戲曲小說之流。或者見異思遷，乃欲持彼之成見，以平章此土之文學，吾未見其為知文學也。⁶⁴

孫世揚表明中國文學不可變、斥責新文學的變革論是見異思遷、不堪一問。孫世揚文中標舉「文足以抒情、意足以感人、音聲節奏可以歌誦」的三大原則，一樣守著「讀書—寫詩—回到先人文學」之自足迴路，與新文學的文學觀根本全無妥

62 蘇維霖，〈二十年來的中國古文學及文學革命的畧述〉，《臺灣民報》2卷10號，1924.06.11，5版。

63 連雅堂，〈臺灣詩薈發刊序〉，《臺灣詩薈》1期（1924.02），無頁碼。

64 孫世揚，〈文學管窺〉，《臺灣詩薈》5期（1924.06），頁35-36。

協可能。

之後，新文學陣營的張梗 1924 年 9 月在《臺灣民報》連載〈討論舊小說的改革問題〉系列文章，⁶⁵ 針對傳統中國文學小說的取材狹隘、手法制式、著重筋脛等「春秋筆法」進行學理批判，主張引用典故、連結古今、一人主觀講道說教的寫作已經不再可行。連雅堂 1924 年 10 月《臺灣詩薈》對此問題回擊，在一篇〈臺灣詠史跋〉短文中，批判新文學只擷取西方戲劇小說的片面、而不能感受中國古典文學承接故籍的浩瀚道理：

今之學子。口未讀六藝之書。目未接百家之論。耳未聆離騷樂府之音。而囂囂然曰。漢文可廢。漢文可廢。甚而提倡新文學鼓吹新體詩。批糠故籍。自命時髦。吾不知其所謂新者何在。其所謂新者特西人小說戲劇之餘焉。其一滴滴沾沾自喜。是誠埳井之蛙不足以語汪洋之海也噫。⁶⁶

至此，新舊文學論戰逐漸明顯展開有關文體的細部辯論，成為「寫實主義」的新詩、新小說，對抗著舊詩、傳統小說的態勢。以下分別由詩和小說討論之。

詩的新舊論戰，主要是張我軍在連雅堂二篇文章之間的 1924 年 11 月至 1925 年 2 月間連發〈為臺灣的文學界一哭〉、〈請合力拆下這座敗草叢中的破舊殿堂〉等多篇文章，且〈為臺灣的文學界一哭〉一文更是針對性駁斥連雅堂「口未讀六藝之書。目未接百家之論」之說。⁶⁷ 1925 年 3 月再寫一篇〈詩體的解放〉，逐步針對舊文人最自豪的「詩」進行批判，且學理愈益加強。這幾篇都明確針對連雅

65 張梗，〈討論舊小說的改革問題〉（一），《臺灣民報》2 卷 17 號，1924.09.11，15-16 版；〈討論舊小說的改革問題〉（二），《臺灣民報》2 卷 18 號，1924.09.21，15-16 版；〈討論舊小說的改革問題〉（三），《臺灣民報》2 卷 19 號，1924.10.01，14-15 版；〈討論舊小說的改革問題〉（四），《臺灣民報》2 卷 20 號，1924.10.11，15-16 版；〈討論舊小說的改革問題〉（五），《臺灣民報》2 卷 21 號，1924.10.21，15-16 版；〈討論舊小說的改革問題〉（六），《臺灣民報》2 卷 22 號，1924.11.01，16 版；〈討論舊小說的改革問題〉（七），《臺灣民報》2 卷 23 號，1924.11.11，20-21 版。

66 連雅堂，〈臺灣詠史跋〉，《臺灣詩薈》10 號（1924.11），頁 11。相關論點參考傅含章，〈論張我軍之批判精神〉，《高醫通識教育學報》9 期（2014.12），頁 89-115。

67 包括張我軍，〈為臺灣的文學界一哭〉，《臺灣民報》2 卷 26 號，1924.12.11，10 版；〈請合力拆下這座敗草叢中的破舊殿堂〉，《臺灣民報》3 卷 1 號，1925.01.01，5-6 版；〈絕無僅有的擊鉢吟的意義〉，《臺

堂的論點而反駁，指明舊詩「執迷著死守已成的法則形式，奉先人偶定的的形式法則為天經地義，實不知他人已定的形式只是自己的監獄，他們把自己的思想感情驅入監獄裡頭」。⁶⁸

1925年5月連雅堂以「棠」為筆名回擊，提出二重點：一是詩必有韻，而新體詩沒有韻，所以採茶歌或打油詩都比新體詩強；二是舊詩的寫法有賦比興三種，而新體詩只有賦一種，因此只能寫實，缺乏含蓄蘊藉。文中連雅堂以略帶諷刺口吻說：

昌黎詩曰：「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不知群兒愚，何故肆毀傷。蟬螿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今之群兒，何其愚也？⁶⁹

連雅堂注意到新文學以舊文學為敵，但連雅堂相信新文學蟬螿無法撼動舊文學大樹，其相信的基礎在於：舊文學承襲「李杜文章千年、文學光燄萬丈」是亙古不變、跨越時空的道理。連雅堂的這二篇論述有一致的論點，亦即：他要捍衛舊文學，是承繼了中國有六藝之書、百家之論等渾厚經典的汪洋之海；而相對的，新文學（如張我軍主張）的缺失，是依附西方的小說、戲劇、新體詩等著重「寫實」形式乃典籍不足。

若以張我軍和連雅堂二造來看，這一段火力旺盛的對話，恰是文學時空體的二種對立端。連雅堂堅持古典詩的「賦比興」能力，並在理論上自豪於中國傳統詩跨越時空、否定文學個體主義；張我軍批判的舊文學，則是特定階級聚集在場吟唱，但卻藉詩詞而連結千年古人以產生歷史共感的作法，因此疾呼文學必須回到個體感受的此時此刻。

灣民報》3卷2號，1925.01.11，6版；〈揭破悶葫蘆〉，《臺灣民報》3卷3號，1925.01.21，43版；〈文學革命運動以來〉，《臺灣民報》3卷6號，1925.02.21，11版；〈文學革命運動以來〉（續），《臺灣民報》3卷8號，1925.03.11，14-15版；〈文學革命運動以來〉（續），《臺灣民報》3卷10號，1925.04.01，13版；〈復鄭軍我書〉，《臺灣民報》3卷6號，1925.02.21，15版。

68 張我軍，〈詩體的解放〉，《臺灣民報》3卷7號，1925.03.01，13-14版；〈詩體的解放〉（續），《臺灣民報》3卷8號，1925.03.11，12-13版；〈詩體的解放〉（續），《臺灣民報》3卷9號，1925.03.21，12-13版。

69 棠，〈餘墨〉，《臺灣詩薈》6期（1925.05），頁22。

小說的論戰是另一個戰場。前述 1924 年 9 月張梗〈討論舊小說的改革問題〉不只批判舊小說，也為台灣新小說提出完整的理論定義。張梗指出幾個關鍵原則：第一是「獨創」、第二是「創作須含意」、第三是「含意須深藏」、第四是「排春秋筆法」、第五是「唱科學的態度」、第六是「歷史與小說須分工」。這裡要特別關注其中第五項「唱科學態度」，就直接扣合到寫實主義技法：

古人乏疑科學思想，只憑腦裏的攪漿捏出小說，亦無怪其然，西洋還未到自然主義，浪漫主義色彩當盛的時代，也是一樣重主觀抒情，而科學的發達影響到文藝方面，一經自然主義的洗禮，就不得不變到寫實主義的態度了。非真不寫，排去一切邪推臆測……。再言之，小說家須以科學的態度為經，寫實筆法為緯，持真劍的態度以付之。⁷⁰

「非實不寫」正是引西方寫實主義以對抗舊有傳奇的基本原則，而且必須搭配擺脫「春秋筆法」那種反覆徵引先人文章迴路之弊。張梗也寫道，「最重要者不外乎描寫」，並是以科學態度進行觀察、描寫，「讓讀者親自看看赤裸人生社會，引起一般輿論改造社會」，要求作者須採「個性」而棄「類性」。⁷¹

如瓦特強調的，寫實主義的重點不是「真實存在」，而是文章的表現必須在吻合生活世界的現實感，即使是虛構，也應該時間、空間上彷彿真實。總結張梗的說法，科學態度的觀察、再進行描寫、針對特定對象的「個性」，都是將作者看世界的眼睛置放在此時此地的新時空認知；相對的，也就是要捨棄傳統文學那種在模糊時空進行引譬連類的「類性」。

新舊文學論戰之前的台灣舊小說，確是具有「模糊時空」、「類性」的特質。日治初期台灣曾出現不少看似現代小說的作品，尤其 1905 年至 1911 年《漢文臺灣日日新報》小說欄的西洋背景的通俗小說。這些很早接觸西方新聞的記者作家創作的小說（如李逸濤〈留學奇緣〉、〈俠鴛鴦〉或魏清德〈傾國恨〉等），

70 張梗，〈討論舊小說的改革問題〉（五），《臺灣民報》2 卷 21 號，16 版。

71 張梗，〈討論舊小說的改革問題〉（六），《臺灣民報》2 卷 22 號，16 版。

雖有賦予發生年代，但行文之後即拼貼西洋和台灣的時空，甚至可能引介西洋異國、科學器具等事物來呈現類似現代的樣貌——但就如黃美娥分析指出，其根底關懷更是東西洋共有的人間世界、倫理道德，也就是，作品的空間是抽象而模糊、時間極度壓縮甚至毫無現實感。⁷²日治初期也有模仿西方的偵探小說，但呂淳鈺也發現多模擬自中國公案小說（如施公案、包公案），雖改白話文講述，偶也寫到新學、新法律、新科技，最終都是根據中國式的倫理人情作為判案準繩，並特別指出這些偵探敘事的重點是「討個公道」而不是「查出罪犯」，落實其內部邏輯是舊體小說的「類性」而非寫實文學的「個性」。⁷³

再看新舊文學論戰發生之際、傳統文人社團「台灣文社」機關刊物《臺灣文藝叢誌》刊載的漢文小說，也有同樣的狀況。吳宗曄檢視該刊 1919 年至 1924 年間的 54 篇漢文小說，刊出時都會註明所屬「類型」，包括節烈、短篇、悲歡、事實、家庭、技擊、軼聞、悟情、醒世、愛國、哀情、神怪、懺悔、痛苦，而且各篇主要訴求都可對應特定的傳統道德模式（女子節操、忠君愛國、維繫孝道、反對自由戀愛等）。吳宗曄總結，這些小說的策略即同傳統中國文學的「類書」。⁷⁴

類書，也正是鄭毓瑜範示文學經典將「物類」、「事類」等成類與連類的關鍵例證，徵示中國文學歷史中早已存在的大量分類系統，在中國第一部類書《皇覽》出現之後更透過語詞訓解、書篇輯錄的分類知識運作而下，成為史家、小學家、目錄學者、乃至中國文人的根本知識系統及生活實踐準則。⁷⁵

前述學者分析的台灣舊體通俗小說，其秉持通性、類性的思維，其時空認知的參照體系也同等於古典漢詩，即如鄭毓瑜「引譬連類」象徵體系。相對的，新文學陣營則在 1924 年底開始，就逐漸強化寫實主義主張的、對現實世界的客觀及科學之觀察。胡適代表的中國新文學論點，就吻合西方寫實主義文學論的具體

72 黃美娥，〈二十世紀初期的「西洋」：《漢文臺灣日日新報》通俗小說中的文化地景、敘事倫理與知識想像〉，《臺灣文學研究集刊》5 期（2009.02），頁 12-16。

73 呂淳鈺，〈日治時期台灣偵探敘事的發生與形成：一個通俗文學新文類的考察〉，頁 34-36。

74 吳宗曄，〈《臺灣文藝叢誌》（1919-1924）傳統與現代的過渡〉（台北：臺灣師範大學台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頁 138。

75 鄭毓瑜，《引譬連類：文學研究的關鍵詞》（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2.09），頁 14-16。

訴求。中國新文學雖在 1923 年開始就有台灣新文學者談及，⁷⁶ 但 1924 年底連載的蔡孝乾〈中國新文學概觀〉，是系統性胡適文學史觀者之初。這系列文章，特別強調中國新文學運動史的「客觀寫實」論點，文中並特別用「攝影」為概念來形容新小說的代表人物魯迅，認為應為台灣文學改革參考：

魯迅是個寂寞冷靜的人，他的作品完全帶著「寫實主義」的色彩。他以客觀的態度，觀察他的環境——自然界、人間，將他所看的所聞的東西，無論何等醜惡、何等卑劣，赤裸裸展開給我們看。他所識的人、他的親戚、他的朋友、他自己，蓋他所記憶著的部分，毫無客氣，老老實實把那些攝影出來的東西，便是他的「吶喊」。⁷⁷

這種蔡孝乾稱魯迅客觀描寫、有如攝影一般的「寫實主義」能力，正是本文開頭蔣渭水 1925 年認知的文學時空——小說是把所識的人、親戚、朋友、自己的觀察描寫出來。新文學在論戰初期訴求的言文一致理念，唯有搭配「寫實主義」背後的新參照體系，亦即威廉斯《長長的革命》指出的「尋常、當下及日常現實」。參照體系一變之後，作者需要做的就是「觀察」，並將觀察「再現」為更大的現實。⁷⁸ 因此西方 19 世紀後的作者不必再服膺過往文學（如史詩）的集體性格，而能在個人的觀察基礎上再現世界。台灣晚出西歐約二百年，路徑同是如此。

因為論戰，文學的使命轉向對「人民」的客觀、無偏的觀察及書寫。新文學作品不能沿用舊有時間，而必須由作者親身提出「可觀察」的對象，這也逼出了作家的「創造性」。但這種創造，不是無中生有的創作，也不是不著史實的漫想，而是根據觀察而生。

大致可總結，新舊文學論戰之文字改革（白話文的言文一致取代文言文），

76 之前亦有秀潮及蘇維霖介紹過胡適的論點，但主要是摘引片斷，未能全面性討論引介胡適。參見秀潮，〈中國新文學運動的過去現在和將來〉，《臺灣民報》1 卷 4 號，3 版、蘇維霖，〈二十年來的中國古文學及文學革命的畧述〉，《臺灣民報》2 卷 10 號，5 版。

77 蔡孝乾，〈中國新文學概觀〉（四），《臺灣民報》3 卷 15 號，1925.05.21，12-13 版。

78 Raymond Williams, *The Long Revolution*, pp. 301-302, p. 308.

並不是論戰的深層重點，時空概念的變革，才是論戰的關鍵所在。新舊文學論戰擴散開來之後，新文學已經捨棄「施公案、包公報」的意義，在於不再是歷史事件模糊化、將真實人物抽離化的類書樣態。1922年起新文學小說起點階段，不論是追風（謝春木）〈她往何處去〉、無名〈神秘的自制島〉，以及〈犬羊禍〉、〈最後的解決如何〉、〈臺娘悲史〉、〈家庭怨〉、〈黃鶯〉，文字運用確實都還看不出「言文一致」的威力；但是，這些小說都表達出關注尋常、當前、每日的世界，不論嚴肅的、通俗的，都幾乎沒有例外將小說的時空設定在「此時此地」，也就是，即使是虛構的，這個場景也是這個社會可以共同察覺的場景。

新舊文學論戰，不是單純的文言變白話而已，新文學並不是自然而然的「我手寫我口」，從時空體的切入點來看，論戰挑戰了舊文學不曾想撼動的引譬連類體系，論戰也為台灣帶進了前所未見的時空認知，從而，台灣新舊文人都可利用觀察事實的能力，表現所處社會的處境。

這些能力當然不是一次論戰就完成。很多研究都指出舊文學也在論戰之後大幅增加時空的現實感，而不是只有新文學人獨占觀察事實、表現社會的能力。但寫實的時空體，確有助呼應此時此地的社會情境。新文學代表人物賴和的文學之路，即可看到他看了世界事物之後的「書寫」態度及方法之轉變。他察覺漢詩的力有未逮、而逐步走向具體時空認知的改變歷程，更能表現社會的結構轉型。

四、賴和新舊詩作的時空感轉變

賴和是台灣舊新文學轉折的文學史代表人物。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定義新文學搖籃期始自1920年《臺灣青年》創刊號，終於賴和第一篇散文〈無題〉發表，以及新文學成熟期始於1926年賴和發表〈鬥鬧熱〉，終於1937年總督府禁用漢文。⁷⁹ 賴和的關鍵意義由此可知一斑。而值得注意之處，更在於自幼習學古典詩文的賴和，恰好在新舊文學論戰期間由漢詩人改作新文學，理解時空認知轉變的絕佳範例。

賴和生在1894年的清國時代，翌年雖即日本統治，但賴和自1907年就一直

79 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註解版）》（高雄：春暉出版社，2010.09）。

在彰化南壇書房「小逸堂」從黃倬其習讀漢學至成年，舊文學根柢厚，長於創作漢詩。⁸⁰所以在1925年轉向新文學運動及寫作新詩、小說、散文之前，賴和有長達近20年的漢詩創作人生。⁸¹

賴和的新文學創作轉折期雖始自1925年，但他疑慮舊文學、嘗試新文學的醞釀可能要更早十年。本文以下將依據時空體為方法，由時空描寫的模糊或具體、書寫人物的類性或個性、文學參照的當下現實或引譬連類為判準，解釋賴和在漢詩力有未殆而轉向新文學的歷程。

賴和的漢詩創作生涯。有兩個時期對照特別明顯。藉由《新編賴和全集》的統計，賴和在1909年至1914年「醫學校時期」創作漢詩321首，而在1919年至1924年的「彰化第二期」創作漢詩349首，兩時期相加占了賴和漢詩總數的65%之多。若再考量這二個時期是賴和1918年至1919年赴中國廈門行醫師前後，更是察看賴和對於中國和台灣時空認知的關鍵：兩個時期的不同漢詩，都是由模糊到具體的時空體。

賴和舊文學時期時空體，可以用「國」和「台灣」兩個用詞的意義加以探究。賴和賦予二詞的空間認知尺度，在1919年自廈門再返台後有所轉折，除了民族情感因素，更宜從文學書寫的參照時空來觀察。若檢視其舊詩中的「國」之用法，賴和1914年以前「醫學校時期」漢詩裡的「國」一字之時空認知尺度，都是指涉個人家園。1908年〈去國吟〉詩句是：

頃刻行千里，悠然動客思。辭家雙淚下，去國一何悲。⁸²

80 施懿琳，〈漢詩卷導讀〉，賴和著，蔡明諺主編，《新編賴和全集 壹·漢詩卷》（台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21.05），頁78-102。

81 依蔡明諺分期，賴和漢詩的經歷可區隔為：（一）小逸堂時期：1908年至1909年3月；（二）醫學校時期：1909年4月至1914年4月；（三）嘉義時期：1914年5月至1916年4月；（四）彰化第一期：1916年5月至1918年1月；（五）廈門時期：1918年2月至1919年8月；（六）彰化第二期：1919年9月至1924年11月。之後進入停筆時期，1924年12月至1936年3月，即為新文學寫作時期。參見蔡明諺，〈漢詩卷編輯凡例〉，賴和著，蔡明諺主編，《新編賴和全集 壹·漢詩卷》，頁23。

82 賴和著，蔡明諺主編，《新編賴和全集 壹·漢詩卷》，頁146。

這首原題〈去去行〉之詩，「去國一何悲」原本稿本用字是「行役一何悲」。典故可能出自李白〈擬恨賦〉「或有從軍永訣，去國長違」，這個「國」當然不是現代國家的國，而是地方家園的意義。去國，意謂離家、離鄉、離國。再至醫學校時期，賴和在〈旅舍書懷〉一首離家讀書的抒發情感，「萬里飛雲遮故國，兩行熱淚落他鄉」，也仍延續著國不是國家、而是家園的意義。⁸³

同是醫學院時期的〈北上車過十六份〉，記的是一人獨行搭乘火車，途經舊名十六份（今苗栗勝興附近）的感受。賴和將獨自乘車描述為孤征，回頭看到的家園描述為故國，也都是用典甚於觀察的作法：

握手匆匆別，離情處處牽。亂山穿墜過，危壑架橋聯。絕景堪吟詠，孤征自可憐。回頭瞻故國，遙在夕陽邊。⁸⁴

賴和在這段時期的其他二首，〈寄興與石錫烈〉所寫字句「萬山黃葉日蕭蕭，故國雲間望轉遙」，另一首〈諸芸兄由夜行車歸校翌日我亦赴嘉義零丁遊子不禁淒涼少舒感慨以報知己〉，寫作場景與前幾首接近，是與好友別離故里，詩句呈現的也是故國：

望迷故國空垂淚，座少知音枉善鳴。共是五陵佳子弟，飄零無乃負平生。⁸⁵

以「故國」來表達離開家鄉，加上後句徵引的是白居易《長恨歌》典故「五陵年少」來譬喻背鄉飄零闖盪之豪情，都是參照先人典籍來印證心境。這些分析都可看出 1908 至 1914 年間的小逸堂及醫學校時期，賴和的「國」都以「故國」、「家園」的概念表達，也就是故鄉、家園的空間感受。詩句內含的時空體，包括「頃刻行千里」、「握手匆匆別」、「遙在夕陽邊」，都有飽滿的以古寓今心境，相對的，現實的時間空間，則是模糊而不具體。這樣的漢詩，符應前述傳統文學「引

83 同註 82，頁 165。

84 同註 82，頁 249。

85 同註 82，頁 336。

譬連類」體系的邏輯。

以「國」抒發自己對於家園、故里之情的用法，在初到廈門的 1918 年初的幾首詩還可看到。例如歌詠軍士的雜詩組合〈廈門雜詠〉，以及贈詩予早年古月吟社詩友的〈中秋寄在臺諸舊識〉，其中的國家、故國依然是故里家園：

三載征衣尚血斑，國家多事死尤艱。卻從百姓抽來稅，孤注樗蒲一擲間。（廈門雜詠）⁸⁶

茫茫故國罹烽火，颯颯西風隕舊枝。萬里客懷傷寂寞，百年大局費支持。
亞歐變幻良宵月，定入樽前感興詩（中秋寄在臺諸舊識）。⁸⁷

這兩首廈門時期詩作之後，至 1919 年賴和返回彰化時期，「國」的用語出現的脈絡，已不全然是故國家園。〈玉壺心事〉和〈千古傷心〉二首為例，可看到「國」的空間尺度漸漸具體、但又蘊含曖昧。

極天歡樂思胡帝，大國威儀笑夜郎。獨立窮荒看窮北，水雲無際意茫茫。（玉壺心事）⁸⁸

千古傷心國破亡，傷心欲訴話偏長。卻教此國能亡破，論罪由來究孰當。（千古傷心）⁸⁹

這兩首是彰化第二期的詩作，這時期的賴和漢詩創作量很大，但國的用量則相對大幅減少，「國」的空間意念也有極大變化。這幾個「大國」、「國破亡」和「此

86 同註 82，頁 408。

87 同註 82，頁 408。

88 賴和著，蔡明諺主編，《新編賴和全集 壹·漢詩卷》，頁 416。「獨立窮荒看窮北」亦有可能是「獨立南荒看窮北」。

89 同註 88，頁 428。

國」，看似喟嘆台灣割讓而離開的「中國」，顯見賴和已將「國」的用字轉向思考民族主義的意涵。陳建忠曾分析 1918 年中國廈門行醫期間的漢詩指出，此時雖見賴和描述現實社會的「寫實」意圖，但詩句之中仍只能以古諷今。⁹⁰大約也在此時感受到某種力有未逮，賴和開始使用「台灣」這個具體的空間概念入詩。〈平生碌碌〉這首長詩，應是賴和漢詩第一次使用到「台灣」二字入詩。

一粟蒼溟絕島懸，臺灣今日有青年。願君筆與身同健，敢為群生上告天。⁹¹

這詩通信對象是王敏川，年長賴和五歲的《臺灣青年》編輯，也是台灣文化協會創始會員。也就是說，1920 年起與文協友人互動，賴和才在漢詩作品轉換過去抽象的「國」，而改為「台灣」這個具體的空間對象。再到 1922 年〈贈長井公學校長〉一詩，是悼念長井實一校長，詩中提到日本治下台灣處於夾縫之艱難，句中再進一步將台灣限定為「吾台」：

種菜蒔花復手工，由來嬉戲稱兒童。吾臺教育方針異，爭得人間競頌功。

十年時局一番新，用世猶嫌未有人。主張育英排眾議，不知謗毀已叢身。⁹²

同在彰化第二期的〈環翠樓送別〉，對比於日本殖民者的台灣日漸清晰：

酒興詩情老更饒，追隨曾與破無聊。日臺差別吟中撤，汝我猜疑飲次消。⁹³

賴和文學的空間已更明確，愈加接近寫實意義的空間。也就是，在瀕臨賴和放棄古典漢詩的停筆期，有較多量使用「台灣」用語，而且賦予台灣愈來愈清楚的邊

90 陳建忠，《賴和的文學與思想研究：書寫台灣·台灣書寫》（高雄：春暉出版社，2004.01），頁 104。

91 同註 88，頁 478。

92 同註 88，頁 504。

93 同註 88，頁 516。

界。在這幾首詩之前，賴和詩作還有一個特殊案例，即稿本寫於 1916 年，但在 1922 年正式刊本時針對「台灣」修改字詞用法，更彰顯 1919 年前後的思慮。這個案例的正式刊本，是賴和以「逸民」之名在《臺灣》公開的〈讀臺史雜感〉，其中幾句是：

旗中黃虎尚如生，國建共和竟不成。天與臺灣原獨立，我疑記載欠分明。⁹⁴

賴和 1916 年左右也寫過同一首詩於〈台灣通史十首之七〉（稿本），而原詩句是「旗中黃虎尚如生，國建共和竟不成。天限台灣難獨立，古今歷歷設分明。」⁹⁵這裡的「國建共和」的國就是台灣民主國，原版本講的台灣，是感嘆「天限臺灣難獨立、古今歷歷證分明」，後一句顯示作者對台灣的觀察距離是遙遠的旁觀。然而 1922 年版本，「我疑記載欠分明」的觀察距離已有巨大變化，「我」其實就站在台灣內部、完全沒有距離的觀察；從而，對台灣自主性的思考開始有了轉變。賴和使用「臺灣」一詞入詩的時空認知，在兩首詩差異甚大，1916 年猶是隔空遠看的抽象台灣，1922 年已是置身其中的具體台灣。以下再就賴和轉向新文學進行創作的時空認知，討論他個人的文學寫作之變化，以期掌握一代文學人之變化。

賴和從舊體詩向新體文的斟酌猶豫，在 1914 年 2 月〈讀書〉一文可看到他對先賢古書無助現實社會的感嘆：

昔時我讀書，但究書中意。以謂古人言，天下無二理。每每希前賢，只望得相擬。喃喃諷誦間，瞬息十年矣。細讀細玩味，亦只如此耳。琳琅滿行間，大都欺人語。昔時每語人，古人實幸耳。今日再細思，古人非吾比。⁹⁶

94 賴和著，蔡明諺主編，《新編賴和全集 壹·漢詩卷》，頁 483。

95 施懿琳，〈賴和漢詩的新思想及其寫作特色〉，《中正大學中文學術年刊》2 期（1999.03），頁 166；施懿琳，〈漢詩卷導讀〉，賴和著，蔡明諺主編，《新編賴和全集 壹·漢詩卷》，頁 89-90。

96 同註 94，頁 322-323。

賴和把過去讀古書的讀寫邏輯形容為「每每希前賢，只望得相擬。喃喃諷誦間，瞬息十年矣」，大抵是源自經典古籍構成的「引譬連類」體系。因此，本來賴和以為「天下無二理」的事情，在吸取其他文學類型後竟覺得「大都欺人語」，再對照賴和此詩稿本寫的，「區區七尺身，不歸我自己。……甚欲學雅禮，經書盡燒棄」，可見賴和已發覺這一套思維不歸自己，但想要擺脫又不知從何做起。

林瑞明考察指出，賴和在廈門時期開始看小說，但主要是中國近代文言章回小說如《玉梨魂》、《雪鴻淚史》、《定夷筆記》等；從廈門回台灣之後，已改看西洋現代小說的翻譯本《灰色馬》、《工人綏惠洛夫》、《噫！無情》（雨果《悲慘世界》）、《處女地》以及《克拉格比》等，而且延續到之後、成為閱讀生涯主要類型。⁹⁷ 這個閱讀類型的視野很開啟，併同前述累積對古書參照體系的遺憾，賴和開始轉換書寫的參照時空。他根據眼前的現實進行創作，也更自由轉向不限格式及韻腳的散文和小說。

楊達曾稱許賴和因醫師身分而「科學常識豐富，又因為職業關係而和貧民接觸頻繁，所以一開始就非常具有寫實風格」。⁹⁸ 科學知識雖有助外部觀察現實，但小說需要的是書寫表達現實的能力，亦即銜接文學的外部與內部的時空體。1919年春夏回應彰化崇文社徵題〈臺灣青年自覺論〉而寫的文章，賴和開始使用「自顧生廿紀文明之世，為帝國榮譽之民，處台灣開闢之地」之類具體時空定位來撰寫散文。⁹⁹ 賴和1923年首度以白話文發表散文形式的小說〈僧寮閒話〉¹⁰⁰，可逐漸看到他無法在漢詩有效施展的寫實描述，已開始轉以小說來表現。在這段創作散文、小說之初期，賴和還殘留了一些以新舊二種不同文體、表達同一經驗的作品。¹⁰¹

97 林瑞明，《台灣文學與時代精神——賴和研究論集》（台北：允晨文化公司，1993.06），頁40-41。

98 楊達著，涂翠花譯，〈臺灣文壇的明日旗手〉，黃英哲主編，《日治時期臺灣文藝評論集：雜誌篇·第二冊》（台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06.10），頁53-54。

99 賴和著，蔡明諺主編，《新編賴和全集 肆·散文卷》（台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21.05），頁50-51。雖然賴和最早一篇試寫的散文始於1913年的〈記事〉，大量撰寫的起點則是這篇〈臺灣青年自覺論〉。

100 同註99，頁40-41。

101 施懿琳，〈賴和漢詩的新思想及其寫作特色〉，《中正大學中文學術年刊》2期，頁151-189。

1923年〈不幸之賣油炸檜的〉同時留下舊詩及小說版本，¹⁰²即可作為探討材料。兩文的故事線相同，都是天亮遇見叫賣油炸檜（油條）的孩子，近中午發現孩子被警察刁難，日暮又相遇聽其講述繼母虐待之事。但兩文的時空體處理方式很不同，賴和也感受到效果之不同。

舊詩〈不幸之賣油炸檜的〉由五言一句、總數五十句組成，大抵是以說書人的全知觀點進行，因此，敘事的視角是跳躍性在進行，起初是敘事者本人的視角開場，「夜長眠易足，覺來色朦朧。……十月嚴霜降，餘寒又東風。我裘尚淒冷，哀彼誰家僮。……一聲油炸檜，屋簷驚凍雀。行經派出所，賣聲猶間作」，之後，迅即換至孩子視角，「忽被警官拘，懼極但淚落」。之後，又迅即換至警察視角，「人家睡正好，枕榻溫暖生」。最後，再回到全知視角進行悲嘆，「飢寒三尺身，呦呦泣路側」，最後以「塵起北風吼，日落天昏黑」回到超越性的悲天憫人的普遍情懷作結。

小說〈不幸之賣油炸檜的〉文約1,700字，表達方式有很不同的改良，場景構成的時間、空間場景都能清楚有效的推進。小說三個主要時空分別是上午六點鐘在家門口前（敘事者遇見叫賣的孩子）、過一會兒的中午在派出所前（敘事者前往探視被警察拉住的孩子）、下午日頭下山在城邊（敘事者又逢見孩子、聽他描述遭警察刁難及後母虐待之事），最後是敘事者內心的聲音「我心裡迷惘了，看他去的遠，終說一聲：小兄弟——祝汝幸福無窮——」。

舊詩書寫之例，是引譬連類式的時空處理模式，如北斗、日暮等文學典故或先人詞藻代替現實描述，敘事也接近傳奇小說的說書人，視角全知任意、情感自由移動，最後以說書人評判世事的感嘆為總結；相對的，小說書寫，則是視角一致，時空清楚具體，也能控制自由間接引言的使用，最後並首尾一貫回到敘事者視角的個體性感受做結。

一樣來自現實的經驗觀察，一樣在1923年書寫，但賴和應已察知不同文體

102 賴和，〈〔不幸之賣油炸檜的〕（稿本一）〉、〈不幸之賣油炸檜的（稿本二）〉，賴和著，蔡明諺主編，《新編賴和全集 貳·小說卷》（台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21.05），頁70-75、75-79。

的社會效果。不少學者已比對出賴和的作品都有經驗或史料的對應事件，¹⁰³ 但即使是虛構的場景，其時空都具體浮現在生活周遭，呼應著社會現實。1926年小說〈一桿秤仔〉的時空表達能力，內容是虛構架空的場景，但事件發生的時間明確有序，鎮南威麗村的空間也彷彿是真實存在的台灣村落，而且已能進出主角秦得參的心理機轉，順暢運用「個性」而具體寫實描繪台灣人和巡警的互動。1930年〈赴會〉一文，更是假借一名似為虛構的青年，但時空具體地描述台灣文化協會之爭議，甚至以主角內心質問霧峰林家能否帶給台灣幸福的疑慮。

賴和這些小說的文字表現，不若舊詩使用典故詞藻之豐富華麗；究其原因，除了創作初期的生澀，更重要的應是文體參照系統已經不同。舊詩書寫的參照來源是先人古書、引譬連類體系，文章皆維持一種全能全知的知識狀態；新小說書寫的參照來源，則是個人透過真實經驗的觀察、模擬個體性的有限生活知覺，自也無法套上典故與先人詞藻。賴和在二種文類的成功轉換，目的就在解決舊文學無法回應所在社會的待解決問題。他曾諷刺寫道：「在這種社會裡，生活著的人們，能夠滿足的，優游自得，嘯詠於青山綠水之間，醉歌於月白花香之下，怕只有舊文學罷？唉！幸福得很！欣羨得很！」¹⁰⁴ 這個欣羨其實是貶抑，因為舊文學書寫的參照來源是非現實的象徵體系，所以不必聞問世事、當然可以無知優游。

循著「時空體」方法論，可見到賴和的社會意識與文學書寫有了成套的世界觀轉變；第一層改變是賴和在舊詩內部對國度、對台灣的時空意義賦予，在1919年後的舊詩已調整時空認知來到此時此刻；第二層改變則進一步以新文學的散文及小說進行轉換嘗試，他對舊文體掌握現實的力有未逮，也轉向小說的形式力求施展。如同陳建忠論斷，小說不只是表達殖民地問題的「實用性」文類，也推動新文學運動進入一個具有新典範的「時代性」文類。¹⁰⁵ 賴和1920年代的寫實主義小說特質，不論虛構與否，都有能力表達現實社會的問題，社會的時空認知也因而有能力被小說轉變。

103 例如蔡明諺，〈土地正義與文學技藝——重讀賴和小說〈善訟的人的故事〉〉，《臺陽文史研究》2期（2017.01），頁29-52。

104 懶雲，〈讀臺日紙的「新舊文學之比較」〉，《臺灣民報》89號，11版。

105 陳建忠，〈賴和的文學與思想研究：書寫台灣·台灣書寫〉，頁444-445。

五、結語

1927年張麗俊作詩寄給櫟社同好的〈六十感懷〉寫道「年華荏苒嘆拋梭，故我仍存鬢已皤，老眼驚看新世界，灰心尤感舊山河」。¹⁰⁶在這首古典詩的韻仗體例之中，張麗俊努力運用典故以呼應引譬連類體系、但又顧及眼前山河歷史變局尋找協調。他和同時代的舊文人看著新世界，正在從廣大帝國浩瀚空間、無限時間的「士大夫朝聖圈」，轉為陪同新文學知識分子一起觀察台灣空間、一面對當前時間。

其實在新舊文學論戰之前的1910年代，台灣已有縱貫鐵路、市區改正計畫等基礎建設的整備，從而營造出全新的現代時間、空間結構；但是，當時的台灣人並未生成一個符合現代結構的時空認知——套用張麗俊的話，住在新世界的台灣人，身體上的眼睛仍是老派的。而至1920年代，台灣的新舊文學論戰發生之際，恰也是殖民治下的台灣人遭逢西化衝擊、醞釀台灣認同之時，因此，新舊文學論戰的詮釋，過去多偏重在民族主義革命的框架。但其實，民族主義形成的前提，也需要文學時空認知的先行改變。一如民族主義研究者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指出的，民族主義作為一種想像共同體而在一個社會發揮威力，並不是憑藉傳統的面對面互動空間，也不是憑藉古老的彌賽亞時間（messianic time）；民族主義的基礎在於：廣泛地域星羅棋布的人們，竟共同相信一個同質而空洞的共時性（simultaneity），在歷史上，這種彼此的想像，都是仰賴小說和報紙而構成。¹⁰⁷

1920年代台灣人的眼睛，能否發展新的能力看到新的世界？賴和說，「新文學是新發見的世界，任各有能力的人去自由墾植」。¹⁰⁸新文學人相信可以，他們也真的身體力行，以正眼仔細觀察這個世界，並確實闖盪出一個文學和社會的時空體之全新變革。但其實，舊文人的老眼，也把驚看的世界轉換成為正眼看待，

106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編纂解說，《水竹居主人日記》七（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4.01），頁263。

107 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9.04），頁108。

108 懶雲，〈讀臺日紙的「新舊文學之比較」〉，《臺灣民報》89號，11版。

只是舊文學需要經過一場知識體系的「問題化」，去衝撞原本理所想然的引譬連類系統，才啟動時空敘事的方法變革。新舊文學論戰不是只有白話文取代文言文那麼簡單，「我手寫我口」其實不只是一句口號，更是一套全新的認知行動，必須結合對此時此刻經驗的觀察、運用清晰時空的描述，個體感受方得延伸至社會。

臺灣文化協會作為一個全島性組織在 1921 年成立之際，台灣文學圈仍以古典詩人及詩社占文壇多數。舊文人皆是透過古人先賢、源遠流長的文學體系進行酬酢交遊。¹⁰⁹ 古典詩人的思想遨遊，既重視先賢文章累積而不以經驗現實的參照，也就不必在意台灣的現實。但新舊文學論戰之後，舊文學體系既被挑戰，也開始在舊文學參照體系加入更多現實元素。而古典詩社詩人遲至 1924 年才創出認知規模擴大到整個台灣的「全島詩人大會」，其實是新舊文學論戰遭到批評而試行脫離困境的行動。¹¹⁰

舊文學也明顯接軌了現代文明！原本被評為舊文學、不問現實的傳統詩社，在 1920 年代末期以後，也逐漸利用報刊管道，提出維護島內漢文、改造台灣社會等議，原本站在舊文學一端的連雅堂、鄭坤五、黃純青等舊文人，也在 1930 年代與推動台灣鄉土文學。亦即舊文學由傳統歷史、生活、故事等素材，順利與新文學最在意的「大眾」站在一起，共同使用新文學關注的可觀察現實、此時此刻時空的概念在寫文學。

文學的時空體，是台灣文學研究的方法論嘗試，不僅是描寫文本結構的理論工具，更是觀察一個時代的社會時空認知之方法論入口。在時空體分析架構下的 1920 年代台灣新舊文學論戰，不論新的或舊的文人，不論新眼或老眼，全都調整成為為正眼看世界的模式，並從文學促動了社會的變革。

109 清末台灣即有大量地區性詩社，日治初期增加一些區域性詩社（台中櫟社、台南南社、台北瀛社等），雖有 1912 年顏雲年辦過「瀛社大會與六社聯吟會」揪集全台各地五十餘位詩人與會，但也偏重文友私人交誼、未串連為全台組織。參見黃美娥，《古典臺灣：文學史·詩社·作家論》（台北：國立編譯館，2007.07），頁 183-227；柯喬文，〈基隆漢詩的在地言說：《詩報》及其相關書寫〉，《中正大學中文學術年刊》12 期（2008.12），頁 163。

110 江寶釵、謝崇耀，〈從日治時期「全島詩人大會」論臺灣詩社的轉型及其時代意義〉，《中正漢學研究》21 期（2013.06），頁 340。

參考資料

一、專書

- 巴赫金 (Mikhail Bakhtin) 著，錢中文主編，白春仁、曉河譯，《小說理論》（中國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06）。
- 王璦玲主編，《空間與文化場域：空間移動之文化詮釋》（台北：漢學研究中心，2009.10）。
- 古繼堂，《臺灣新詩發展史》（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9.07）。
- 呂紹理，《水螺響起：日治時期台灣社會的生活作息》（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998.03）。
- 林瑞明，《台灣文學與時代精神——賴和研究論集》（台北：允晨文化公司，1993.06）。
- 河原功著，莫素微譯，《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展開：與日本文學的接點》（台北：全華科技圖書，2004.03）。
- 柯慶明，《沉思與行動：柯慶明論臺灣現代文學與文學教育》（台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21.04）。
- 若林正文著，許佩賢譯，《臺灣抗日運動史研究》全新增補版（台北：大家出版，2020.03）。
- 班納迪克·安德森 (Benedict Anderson) 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9.04）。
-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編纂解說，《水竹居主人日記》七（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4.01）。
- 陳少廷，《臺灣新文學運動簡史》（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77.01）。
- 陳建忠，《賴和的文學與思想研究：書寫台灣·台灣書寫》（高雄：春暉出版社，2004.01）。
- ，《被詛咒的文學：戰後初期（1945-1949）》（台北：國家教育研究院，2007.01）。
- 陳國球，《抒情傳統論與中國文學史》（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2021.07）。
- 陳翠蓮，《自治之夢：日治時期到二二八的臺灣民主運動》（台北：春山出版，2020.08）。
- 彭瑞金，《臺灣新文學運動四十年》（台北：自立晚報出版社，1992.04）。
- 黃美娥，《重層現代性鏡象——日治時代台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台北：

- 麥田出版社，2004.12）。
- ，《古典臺灣：文學史·詩社·作家論》（台北：國立編譯館，2007.07）。
- 黃英哲主編，《日治時期臺灣文藝評論集：雜誌篇·第二冊》（台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06.10）。
- 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註解版）》（高雄：春暉出版社，2010.09）。
- ，彭瑞金主編，《葉石濤全集 18 評論卷六》（台南：國立台灣文學備處；高雄：高雄市政府文化局，2008.04）。
- 葉榮鐘，《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下（台中：晨星出版公司，2000.08）。
- 鈴木貞美著，王成譯，《文學的概念》（中國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
- 鄭毓瑜，《引譬連類：文學研究的關鍵詞》（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2.09）。
- 賴和著，蔡明諺主編，《新編賴和全集 壹·漢詩卷》（台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21.05）。
- 著，——主編，《新編賴和全集 貳·小說卷》（台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21.05）。
- 著，——主編，《新編賴和全集 肆·散文卷》（台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21.05）。
- 蘇碩斌，《看不見與看得見的臺北》（台北：群學出版公司，2010.09）。
- Bakhtin, Mikhail.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Four Essays*. Translated by Caryl Emerson and Michael Holquist, edited by Michael Holquist,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1.
- Bemong, Neel., et al., editors. *Bakhtin's Theory of the Literary Chronotope: Reflections, Applications, Perspectives*. Academia Press, 2010.
- Davis, Lennard J. *Factual Fictions: The Origins of the English Novel*.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97.
- Dentith, Simon. *Bakhtinian Thought: An Introductory Reader*. Routledge, 1995.
- Foucault, Michel. *Ethics: Subjectivity and Truth*. Translated by Robert Hurley and others, edited by Paul Rabinow, The New Press, 1997.
- Watt, Ian. *The Rise of The Novel: Studies in Defoe, Richardson and Fielding*.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7.
- Williams, Raymond. *The Long Revolution*. Penguin, 1961.

——.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二、論文

(一) 期刊

- 本橋哲也，〈バフチンと「民衆」文化の力学——クロノトポスとしての演劇・小説・詩〉，
《思想》940期（2002.08），頁47-65。
- 甘文芳，〈實社會與文學〉，《臺灣青年》3卷3號（1921.09），頁33-35。
- 江寶釵、謝崇耀，〈從日治時期「全島詩人大會」論臺灣詩社的轉型及其時代意義〉，《中
正漢學研究》21期（2013.06），頁327-359。
- 吳密察，〈「台灣文化」的歷史建構——一個初步的試論〉，《台灣國際研究季刊》10
卷3期（2014.09），頁1-22。
- 李知灝，〈社群的「現代」意義：以「櫟社」暨其詩人作品為研究中心〉，《台灣文學研究》
5期（2013.12），頁95-135。
- 施懿琳，〈賴和漢詩的新思想及其寫作特色〉，《中正大學中文學術年刊》2期
（1999.03），頁151-189。
- 柯喬文，〈基隆漢詩的在地言說：《詩報》及其相關書寫〉，《中正大學中文學術年刊》
12期（2008.12），頁161-199。
- 孫世揚，〈文學管窺〉，《臺灣詩薈》5號（1924.06），頁35-36。
- 張恆豪，〈評追風〔謝春木〕及其小說《她要往何處去》〉，《國文天地》77期（1991.10），
頁40-44。
- 許俊雅，〈日治時期台灣報刊小說的改寫現象及其敘述策略〉，《台灣文學學報》23期
（2013.12），頁137-174。
- 連雅棠，〈臺灣詩薈發刊序〉，《臺灣詩薈》1期（1924.02），無頁碼。
- 連雅堂，〈臺灣詠史跋〉，《臺灣詩薈》10號（1924.11），頁11。
- 陳斡，〈文學與職務〉，《臺灣青年》創刊號（1920.07），頁41-43。
- 陳端明，〈日用文鼓吹論〉，《臺灣青年》4卷1號（1922.01），頁25-27。
- 傅含章，〈論張我軍之批判精神〉，《高醫通識教育學報》9期（2014.12），頁89-
115。
- 棠，〈餘墨〉，《臺灣詩薈》6號（1924.07），頁22。
- 黃呈聰，〈論普及白話文的新使命〉，《臺灣》4年1號（1923.01），頁12-25。

- 黃美娥，〈二十世紀初期的「西洋」：《漢文臺灣日日新報》通俗小說中的文化地景、敘事倫理與知識想像〉，《臺灣文學研究集刊》5期（2009.02），頁1-39。
- 黃朝琴，〈漢文改革論〉，《臺灣》4年1號（1923.01），頁25-31。
- ，〈續漢文改革論〉，《臺灣》4年2號（1923.02），頁21-28。
- 葉連鵬，〈重讀日據時期台灣新舊文學論戰起因、過程與結果的再思考〉，《台灣文學學報》2期（2001.02），頁33-66。
- 廖振富，〈百年風騷，誰主浮沉？——二十世紀台灣兩大傳統詩社：櫟社、瀛社之對照觀察〉，《台灣文學研究學報》9期（2009.10），頁205-248。
- 廖棟樑，〈書評：《引譬連類：文學研究的關鍵詞》〉，《中國文哲研究集刊》42期（2013.03），頁249-255。
- 蔡明諺，〈土地正義與文學技藝——重讀賴和小說〈善訟的人的故事〉〉，《臺陽文史研究》2期（2017.01），頁29-52。
- 蔡淵黎，〈清代臺灣社會領導階層性質之轉變〉，《史聯雜誌》3期（1983.06），頁34-64。
- 鄭毓瑜，〈類與物——古典詩文的「物」背景〉，《清華學報》41卷1期（2011.03），頁3-37。
- ，〈「文」的發源——從「天文」與「人文」的類比談起〉，《政大中文學報》15期（2011.06），頁113-142。
- ，〈1870年代中、日漢詩人的視域轉換——以博物知識、博覽會為認知框架的討論〉，《淡江中文學報》25期（2011.12），頁94-130。
- Blommaert, Jan. "Chronotopes, Scales, and Complexity in the Study of Language in Society."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vol. 44, 2015, pp. 105-116.
- Schwarz, Daniel. "The Importance of Ian Watt's *The Rise of the Novel*." *The Journal of Narrative Technique*, vol. 13, no. 2, 1983, pp. 59-73.
- Seidel, Michael. "The Man Who Came to Dinner: Ian Watt and the Theory of Formal Realism." *Eighteenth-Century Fiction*, vol. 12, no. 2-3, 2000, pp. 193-212.

（二）學位論文

- 吳宗曄，〈《臺灣文藝叢誌》（1919-1924）傳統與現代的過渡〉（台北：臺灣師範大學台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 呂淳鈺，〈日治時期台灣偵探敘事的發生與形成：一個通俗文學新文類的考察〉（台北：

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李敏忠，〈日治初期殖民現代性研究——以《臺灣日日新報》漢文報衛生論述（1898-1906）為主〉（台南：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碩士論文，2004）。

崔末順，〈現代性與臺灣文學的發展（1920-1949）〉（台北：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4）。

張俐璇，〈建構與流變：「寫實主義」與臺灣小說生產〉（台南：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博士論文，2014）。

許倍榕，〈日治時期台灣的「文學」概念演變〉（台南：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博士論文，2015）。

三、報紙文章

秀潮，〈中國新文學運動的過去現在和將來〉，《臺灣民報》1卷4號，1923.07.15，3版。

施文杞，〈對於臺灣人所做的白話文的我見〉，《臺灣民報》2卷4號，1924.03.11，8版。

高冠吾，〈漢文字改革之管見〉，《臺灣民報》1卷13號，1923.12.11，4版。

張我軍，〈致臺灣青年的一封信〉，《臺灣民報》2卷7號，1924.04.21，10版。

——，〈為臺灣的文學界一哭〉，《臺灣民報》2卷26號，1924.12.11，10版。

——，〈請合力拆下這座敗草叢中的破舊殿堂〉，《臺灣民報》3卷1號，1925.01.01，5-6版。

——，〈絕無僅有的擊鉢吟的意義〉，《臺灣民報》3卷2號，1925.01.11，6版。

——，〈揭破悶葫蘆〉，《臺灣民報》3卷3號，1925.01.21，43版。

——，〈復鄭軍我書〉，《臺灣民報》3卷6號，1925.02.21，15版。

——，〈文學革命運動以來〉，《臺灣民報》3卷6號，1925.02.21，11版。

——，〈文學革命運動以來〉（續），《臺灣民報》3卷8號，1925.03.11，14-15版。

——，〈文學革命運動以來〉（續），《臺灣民報》3卷10號，1925.04.01，13版。

——，〈詩體的解放〉，《臺灣民報》3卷7號，1925.03.01，13-14版。

——，〈詩體的解放〉（續），《臺灣民報》3卷8號，1925.03.11，12-13版。

——，〈詩體的解放〉（續），《臺灣民報》3卷9號，1925.03.21，12-13版。

張梗，〈討論舊小說的改革問題〉（一），《臺灣民報》2卷17號，1924.09.11，15-16版。

——，〈討論舊小說的改革問題〉（二），《臺灣民報》2卷18號，1924.09.21，15-16版。

——，〈討論舊小說的改革問題〉（三），《臺灣民報》2卷19號，1924.10.01，14-15版。

——，〈討論舊小說的改革問題〉（四），《臺灣民報》2卷20號，1924.10.11，15-16版。

- ，〈討論舊小說的改革問題〉（五），《臺灣民報》2卷21號，1924.10.21，15-16版。
- ，〈討論舊小說的改革問題〉（六），《臺灣民報》2卷22號，1924.11.01，16版。
- ，〈討論舊小說的改革問題〉（七），《臺灣民報》2卷23號，1924.11.11，20-21版。
- 雪漁攷誌，〈文學辨義〉，《漢文臺灣日日新報》2847號，1907.10.28，3版。
- 逸民，〈對在臺灣研究白話文的我見〉，《臺灣民報》2卷4號，1924.03.11，8版。
- 逸濤山人，〈小說芻言〉，《漢文臺灣日日新報》2601號，1907.01.01，5版。
- 潤徽生，〈論文學〉，《臺灣民報》1卷14號，1923.12.21，3版。
- 蔡孝乾，〈中國新文學概觀〉（四），《臺灣民報》3卷15號，1925.05.21，12-13版。
- 蔣渭水，〈五個年中的我〉，《臺灣民報》67號，1925.08.16，43-45版。
- 懶雲，〈讀臺日紙上的「新舊文學之比較」〉，《臺灣民報》89號，1926.01.24，11版。
- 蘇維霖，〈二十年來的中國古文學及文學革命的畧述〉，《臺灣民報》2卷10號，1924.06.11，5版。

